

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

戴建兵 王晓岚 陈晓荣 著

中国农业出版社

前 言

在人类历史货币文化中，有两枝流芳百世的奇葩，一是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的货币文化，它曾影响了亚洲许多国家的货币文化千余年；一是古希腊的货币文化，它是西方货币文化的发源地，而后又派生出阿拉伯和印度钱币两大体系。

从钱币形制上来说，中国古代钱币注意于文字，以书法美蕴藏于钱币的方圆之中；而希腊货币则以图案见长，神像、英雄、动物和植物构成了货币的主图案。

中国钱币自秦半两钱以来，其形制一般为方形圆孔，人们戏称之为孔方兄。一开始，钱币是计重的，如秦的半两钱、汉的五铢钱。但自唐代以后，年号钱开始占优势，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文化对亚洲国家货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亚洲许多国家的铸币从形制、重量甚至名称也与中国钱币基本一致，它们一般为圆形方孔，使用汉字，名称也叫“通宝”、“元宝”。日本早在奈良时代和铜元年（708年）就铸造了汉文的“和同开珍”钱；朝鲜在成宗十五年（996年）开始仿铸中国的“乾元重宝”钱；琉球秦久王于公元1453年铸造了汉文的“大世通宝”钱。越南在公元970年铸汉文“太平通宝”。一直到近代，这些国家仍铸造类似于中国钱币的汉字钱币流通。圆形方孔成为汉文化货币圈的符号，古代中亚、东南亚许多国家都采用这种形制。钱币的衡制基本上依照中国唐代“开元通宝”钱



为标准，直径大都在 2.5 厘米左右，小平钱重量 4 克上下。

第二，一些国家完全仿铸中国货币在其国内流通。在古代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交往中，中国钱币作为友好使者曾广布亚洲，许多国家纷纷仿铸，如日本曾仿铸中国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 36 种年号钱；越南仿铸了 14 种中国年号钱；朝鲜也曾仿铸唐代钱币。印度尼西亚仿铸中国古代唐、宋的年号钱。

第三，亚洲许多国家的钱币不仅使用汉文，而且与中国古代的钱币一样，刻意追求钱币上文字的书法艺术美，以此来追求钱币的美感。如琉球国的“龙”字铜币，如果没有深厚的中国书法功底，那活灵活现的“龙”字是写不出来的。泰国也发现了标有汉字的金银币。华侨更是在东南亚国家发行汉字钱币。

第四，亚洲钱币继承了中国古代钱币的一些传统。中国古代钱币常在钱背铸有文字，以此说明铸地、铸时。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钱币也在钱币上加铸文字，如朝鲜 1678 年铸造的“常平通宝”，日本 1625 年铸造的“宽永通宝”等等。

第五，中国古代纸币曾极大地影响了亚洲国家，朝鲜、日本、越南古代都曾发行纸币，而元代波斯伊利汗国也发行纸币，一直到现在，伊朗人还称纸币为“钞”。

第六，中国以及东亚、东南亚各国的钱币均系采用模型浇铸生产钱币，将熔化了了的金属液体，灌入型腔之内，待冷却后取出再加工便成。

货币是贸易之血，贸易是货币文化交流的基础，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古代丝绸之路总体粗论有四条，第一条是传统的丝绸之路，发端于洛阳、长安，过河西走廊，西出阳关，沿天山南麓，越葱岭入中亚至地中海南岸。第二条源于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的东南沿海至欧洲，新大陆出现后，由于欧洲人将美洲白银运至中国交换中国的丝绸，因而又称为“丝银之路。”第三条是西南丝绸之路，从成都经云南、缅甸至印度过中亚至欧洲。第四条是北方经



蒙古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

中国钱币曾是国际贸易中的世界通货，是丝绸之路特别是亚洲贸易中的媒介。古代中国与亚洲诸国的经济贸易来往十分密切，许多国家与中国贸易时需要的竟然是中国的铜钱。早在宋代“海舶之泄，海船高大，多以货物覆其上，其内尽载铜钱，转之外国。朝廷虽设官禁，那曾检点得出！”^①日本在明代时多次派人至中国贸易，要求中国给以铜币。随同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在其《瀛涯胜略》一书中称：“爪哇、旧港、锡兰均用中国钱。”西沙群岛出土了大批的明代钱币，就是郑和当时下西洋时的遗留之物。

中国古钱还远在非洲出土，现在所知共计约300余枚，其中唐代、五代各1枚，北宋142枚，南宋64枚，明代10枚，清代4枚，年代不明、钱文不清105枚。

9世纪中叶，波斯湾的锡拉夫就通行中国的方孔圆钱，据《东非发现的我国文物》一文报道：“东非海岸发现数量多得惊人的华瓷和钱币，对中世纪东非海岸史年月的确定是很有帮助的”。发现中国钱币最多的是东非海岸马里的摩加迪沙、布腊瓦、梅尔卡；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马菲亚岛、基尔瓦群岛。

早在1888年，桑给巴尔已有宋钱出土。1944年，桑给巴尔岛东南的卡杰瓦(Kajengwa)发现一处中国钱币窖藏，出土大约167枚钱币，其中唐“开元通宝”钱4枚，北宋钱108枚，南宋钱55枚，发现钱币窖藏的地点离中国帆船常到的翁古贾很近。^②1898年在索马里摩加迪沙三个地方发现宋代钱币，多为11~12世纪所铸。后又发现过“永乐通宝”。而在布腊瓦1959年出土了宋钱和“顺治通宝”。梅卡尔也出土过中国古钱。^③坦桑尼亚

① 《朱子语类》，论财。

② 盛观熙：《中国古代钱币的海外流播与意义》，《亚洲钱币》，1999年第1期。

③ 转引自虞逸仲：《从邻国钱币研究中华货币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第六次东南亚历史货币及海上丝绸之路货币研讨会论文集》，浙江省钱币学会，宁波市钱币学会，1995年6月。



于1916年在马菲亚岛出土宋神宗时代钱币（1068—1085年）1枚，另2枚是在1954年发现的。分别为南宋的“庆元通宝”和“绍定通宝”。^①在坦桑尼亚基尔瓦也发现“淳化元宝”1枚。“熙宁元宝”4枚，“政和通宝”1枚。^②在肯尼亚马林迪附近的格迪古城也发现2枚南宋币。另在安哥瓦纳也发现了5枚宋钱，1枚明钱。^③

非洲出土的中国钱币中，有90%以上是两宋钱，这些数量不少的中国铜钱，大部分由当时的中国商船队，从海上带到非洲各国，经过商业贸易而遗留下来的。中国钱币在非洲的出土，进一步证实中非古代海上通道，在宋代就已经延伸到遥远的非洲大陆。^④

货币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波斯银币、东罗马金币、阿拉伯钱币及日本朝鲜、越南的古代钱币在中国多有发现，有的存量极大。明中叶后，西方国家的银币也大量流入中国。鸦片战争以后，外国铜钱也乘机大量流入中国市场。当时在中国货币市场上通用的外国铜钱，有日本的宽永通宝，朝鲜的常平通宝，安南的光中通宝、景盛通宝、景兴通宝、景兴巨宝、景兴泉宝、景兴大宝和嘉隆通宝等，在这些外国铜钱中，安南的光中、景盛、景兴、嘉隆钱身轻薄，当时称为“夷钱”、“外国轻钱”、“皮钱”或“水上漂”。道光九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就请严禁外国轻钱流入中国“广东省行使钱文内，有光中通宝、景盛通宝两种最多，间有景兴通宝、景兴世宝、景兴大宝、嘉隆通宝，谓之夷钱，夹杂行使，十居六七，潮州尤甚，并有数处专使夷钱。内地奸民利其钱

① 吴平：《海上丝绸之路货币探索》，《福建钱币》，1994年第3、4期。

② 盛观熙：《中国古代钱币的海外流播与意义》，《亚洲钱币》，1999年第1期。

③ 转引自虞逸仲：《从邻国钱币研究中华货币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第六次东南亚历史货币及海上丝绸之路货币研讨会论文集》，浙江省钱币学会，宁波市钱币学会，1995年6月。

④ 盛观熙：《中国古代钱币的海外流播与意义》，《亚洲钱币》，1999年第1期。



质浇薄，依样仿铸，日积日多，且恐有另立名号托为夷钱，不可不防其渐。……如有积存前项夷钱，每斤照部议给制钱六十文，统限半年期内呈缴净尽。……至此等夷钱铜色铅砂夹杂，不堪煎炼，且恐收缴零星，徒费工火，转于鼓铸阻滞，应毋庸运局搭铸，即令各州县将收缴夷钱，候限满解省销毁。……”^①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钱币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流通，而且起到过本位币的作用，同时也应注意在中国境内沿海地区盗铸外国钱币在国内流通的史实。

中国货币文化与西方货币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其产生到发展，特别是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以及从一种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经济形态过渡中所起的作用，货币理论，政府对货币控制，货币本位等等都有着巨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社会经济、金融的发展，以至于构造出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货币文化的交流是经济史的重要问题，也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道路密切相关，近代货币制度的建立，金融体系的变革，无不内涵着货币文化交流的影子。

外国钱币除在广东进口外，还从福建、山东等处流入。道光九年，闽浙总督孙尔准、福建巡抚韩克钧也有奏折云：“泉州、漳州间有夷钱限期收缴，按次换给制钱。”同年底山东巡抚纳尔经额奏：“兖州间或有光中、景盛字样钱同，拟倍价收买，每一文换制钱二文。”二十年鸿鵬寺卿黄爵滋奏称：“夷钱之来路，不特来自外洋，亦有私铸出内地，自漳、泉二府行使夷钱，每千掺入几之十分之六、七，以光中最多，景盛次之，亦有潮州嘉应州所铸，托名夷钱。”同年给事中巫宜稷也有奏折称：“汀州府属夷钱，俗称皮钱，每千几及十分之八九，掺铸沙土，两指一捏可以破碎。……”^②

①、② 李翰：《晚清时期中国市场上流通的外国铜钱》，《中国钱币》，1985年第1期。



早在美元成了世界货币之前，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有下面几种货币可以称得上是世界货币，一是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货币，特别是后期拜占廷钱币；二是阿拉伯货币；三是中国古代货币，特别是唐以后的铜钱；四是波斯银币；五是西班牙银元。这些货币都在世界贸易和人们的经济生活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由于贸易的关系，中国古代史籍早就记载了外国钱币。如《史记》、《汉书》记安息国货币：以银为钱，钱上铸国王像；国王死后，钱币上的肖像则随之更改。南宋的《泉志》一书更是集当时外国钱币之大成。清代中期，考据发展起来，乾隆年间翁树培的《古泉汇考》等著作对外国传来的钱币给予了注意。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丁福葆致力于古钱学研究，创办泉币学社。编纂巨著《古钱大辞典》，收录外国钱币数百种。当代著名的学者张星琅编成《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保存了许多外国钱币资料。历史学家向达翻译了斯坦因在中亚的考古成果，出版了《斯坦因中亚考古记》，介绍了斯坦因在中亚发掘的古钱币概况。彭信威教授《中国货币史》一书，堪称中国货币史、钱币学的开山之作。对通过丝绸之路传过来的外国钱币给予了特别重视，并重点介绍了东罗马金币和波斯萨珊银币在中国的发现和流通情况。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对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国外钱币非常重视，以著名考古学家夏鼐、黄文弼为主要代表。30年代，黄文弼在新疆考古调查时就发现了许多丝路外国钱币，40年代，夏鼐先生沿丝路从陕西、甘肃到新疆调查。对安息钱币、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银币、阿拉伯金银币及其他中亚钱币，发表了数十篇系列研究论文。

80年代以来，在中国钱币学会的推动下，成立了由甘肃、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宁夏、陕西、河南、山西、四川、云南等11省区钱币学会组成的中国钱币学会丝绸之路货币研究组。推动了中国丝绸之路货币研究的发展，涌现出了一批高水平



的研究成果，沟通中国钱币学会的对外学术交流。现在已经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丝路货币》等十余部专著。

近年来，国内关于中外货币交流的研究十分热，涌现出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新疆是我国研究丝绸之路货币和相关国家货币最为权威的地方，蒋其祥先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西北一些省份的钱币研究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如甘肃的康柳硕、刘大有等。林梅村先生对古代丝路货币的研究在国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加拿大的杜维善先生收藏了大量的丝路货币，并捐献给了上海钱币博物馆，且出有专著。广东的王贵枕先生对广东出土的波斯银币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台湾的戴学文对西班牙银币的研究均为佳作。

钱币学在西方学术界有着十分显赫的地位，其中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德国、瑞典、荷兰、俄罗斯、印度等国家都有一批造诣深厚的钱币学者和专家。在丝路货币方面，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德国勒科克、俄罗斯科兹洛夫、日本桔瑞超、瑞典斯文赫定等人在中亚和中国西部进行考古调查时，从中国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挖掘走许多珍贵文物和钱币，保存于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博物馆、俄罗斯彼得堡博物馆、德国国家博物馆、日本大谷龙藏寺等地。这些钱币资料数量十分庞大。

西方国家对于古代希腊、罗马、印度的钱币研究著作早已是汗牛充栋，此不多言。

对于与中国钱币有关的一些国家的钱币，西方的一些钱币学家也多有涉及。西方国家发表一批研究波斯萨珊钱币的专著，如50年代摩根《东方古币手册》、倭尔克《阿拉伯—萨珊式古币目录》、普波《波斯艺术综述》等。西方早期研究波斯钱币的著作有瓦伦丁的《萨珊钱币》，这是第一部有关这一王朝钱币的专著，瓦伦丁写出了《印度钱币》和关于阿拉伯钱币的《穆罕默德国家的现代铜币》。1976年，巴鲁克出版了《萨珊钱币》，1968年弋



贝尔发表了《萨珊钱币学》，1985年，塞尔伍德发表了《萨珊钱币学导论》一书。在此之前他还出版了《安息钱币》一书。^①前苏联发表一批中亚古币研究成果，如斯米尔诺娃《粟特青铜钱币》等。70年代以来，外国发表的丝路货币论文和著作比较多，研究范围也更广泛，如，印度对贵霜帝国钱币的研究，英国大英博物馆克利布对汉佉二体文钱币的研究，荷兰易仲廷对哈喇汗王朝钱币的研究，俄罗斯彼得堡博物馆捷马儿对中亚钱币的研究，法国蒂埃里对拜占廷金币的研究，波兰波佩拉维支对大夏钱币的研究，日本平山郁夫在中亚各地收集的钱币藏品等。值得一提的是外国钱币学者在研究丝绸之路钱币时，对中亚、印度、日本、东南亚出土发现的中国钱币常感兴趣，给予了关注，也发表了许多研究论文。如前苏联斯米尔诺娃教授对中亚塔吉克斯坦出土的中国开元通宝钱的研究，印度学者对印度泰米尔杜邦出土的中国宋代钱币的研究，俄罗斯学者对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地区出土的中国五铢钱的研究，日本学者对日本出土发现的中国历代钱币的研究等。^②

在对伊斯兰钱币的研究，法国的汉尼魁（Hennequin）编著的《伊斯兰钱币目录——塞尔柱王朝及其后各朝至蒙古人入侵亚细亚前》，巴黎国家图书馆1985年版共932页，其中50页插图，共收录了2000千多枚钱币。在50页插图之中收集了62幅原大的钱币照片。这部目录所收集的钱币是由塞尔柱（Seljuks）王朝及其后直至蒙古人入侵这段历史年代所发行的。在地理位置上包括现在的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的亚洲部分。从年代上讲，约在伊斯兰纪元433—869年（公元1041—1464之间）。大英博物馆早就为其收藏的伊斯兰钱币编过一部比较完整的目录，

① 李铁生：《有关萨珊钱币的四本英文专著》，《内蒙古金融·钱币专刊》，1994年第3期。

② 康柳硕：《丝绸之路货币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兰州金融》，1995年增2。



目录的最后一卷是在近一个世纪前出版的，这部有 10 卷的目录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约翰·华克尔 (John walker) 在 1941 年就开始重新修订，至今还未完成第 2 卷。现在大英博物馆仍是世界研究东方钱币的重要基地，克力布、汪海岚等人在研究中国钱币及中外钱币交流方面均多有建树。而且其东方钱币学会 (ONS) 在世界上也极有影响。

早在 1881 年时，英国就出版了一本《蒙古钱币》，是根据大英博物馆的藏品编辑的，这本书后来由洪文卿在光绪十六年出使英国时译出。改名为《蒙古西域诸国钱谱》，1891 年出版，原书有图 687 幅，但译书仅选录了其中一部分。

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代钱币的研究，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中国钱币学者应当认真学习和研究的。近年来，韩国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中朝两国的货币文化交流问题，并发表了一些论文。日本的《方泉处》钱币杂志是其发表文章的阵地。

而新加坡的钱币学者，如黄汉森等人更是组织了亚洲钱币学会，中国与东南亚货币文化交流是他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创办的刊物为《亚洲钱币》，已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法国的蒂埃里、荷兰的易仲廷更是对中国与外国的货币文化交流情有独钟，他们在各种媒体上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文章。

目 录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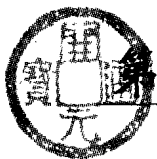
第一章 中国历代货币的历程	1
一、古代钱币	1
二、方孔圆钱	8
三、银两	29
四、纸币	35
第二章 中国与古希腊、罗马的货币	
文化交流	40
一、亚历山大大帝的钱币遗产	40
二、外文铜、铅饼	48
三、有钱自罗马来	56
四、中国出土的威尼斯银币	63
第三章 中国与古代西亚的货币	
文化交流	65
一、波斯银币	65
二、波斯纸币	73
三、阿拉伯钱币	77
四、中国记载的塞尔柱钱币	82



第四章 中国与古代东亚的货币	
文化交流	84
一、中国与日本的货币文化交流	84
二、中国与朝鲜的货币文化交流	101
第五章 中国与古代东南亚的货币	
文化交流	114
一、中国与越南的货币文化交流	114
二、马来西亚的华人锡币	122
三、泰国的子弹银、瓷钱和汉字金币	125
四、印度尼西亚的汉字铅钱	129
五、中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货币文化交流	137
第六章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货币文化交流	143
一、龟兹五铢	143
二、唐代货币文化的西传	145
三、黑汗钱币	155
四、西辽的钱币	157
五、蒙古汗国钱币的阿拉伯化	161
六、清代西部钱币	170
第七章 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货币	
文化交流	178
一、印度和中国的钱币文化交流	178
二、尼泊尔和西藏钱币	184
三、斯里兰卡出土的中国钱币	189



第八章 中国与美洲国家的货币 文化交流	190
一、银元之祖——西属殖民地银币	190
二、流布四海的墨西哥银元	208
第九章 西方国家货币对中国近代币制 的冲击	209
一、西方国家银元的流通与中国银、铜元的铸造	209
二、外国银行券的流通与中国银行券的发行	217



一章

中国历代货币的历程

一、古代钱币

传说中，我国古代最早铸造货币的人是大禹。《管子》一书说：“禹以厉山之金铸币。”《盐铁论》则说：“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意思是说贝币早在夏代就已经使用了。人们一般认为，在商代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用贝作为货币使用了。

商代是中国奴隶社会商业最为发达的朝代，由于商代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且又经历了3次较大的社会分工，社会经济生活中才开始出现了货币。这从出土的大量甲骨文献中可以得到证明。当然也可以从现在使用的汉字中，找到贝和货币的关系。一些与钱财有关的汉字，往往和“贝”字有关，如：货、财、赋、费、贾、贷、贵、贱、败、贡、贪、购、贮……

海贝天然就具有做为货币的有利条件，它本身有价值，有天生的单位便于计数，又坚固耐用，便于携带，而且数量不多。在我国，贝之所以可以成为货币，和它在中原地区的稀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可以当成货币的海贝只有2种，一种是货贝，一种是紫贝又叫阿文绶贝。一开始贝是用来作装饰品的，代表夏代文化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就出土过海贝。

商代墓葬中更是大量出土海贝，基本上作为殉葬品而陪葬的，20世纪70年代时曾在陕西普渡村一次就发现上千枚。1958年在安阳大司空村，发掘了51座平民墓，发现有贝币殉葬的11座，一般以1贝为多，最多的一个有13枚之多。贝的计值单位



是朋，而1朋到底是多少个贝，现在有2枚、5枚、10枚3种说法。

海贝在当时的价值是很高的，80朋贝可换田10块。在甲骨文中，赐贝50朋以上的纪录是不多见的。考古发现证明，古人不仅从很远的南方获取海贝，而且还制造了多种类型的海贝代用品。比如有土质的，就是用陶土制造的，人称陶贝，这在殷墟就有出土。还有骨贝，就是用动物的骨头磨制而成的贝，这种贝在河南、山西、河北、山东以至于青海都有大量出土。还有一种蚌贝，是用蚌壳磨制而成的。这些仿制品到底是不是货币，人们还有争论，有的人认为是装饰品。

金属铸造的贝币现在出土的比较少，人们认为这也是一种当时通行的货币，有的铜贝上还包着金，此外一些地方还发现了铅贝。最为奇特的是在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墓葬里发现了金贝和银贝。到了周朝的时候，金属铸币开始大量出现，海贝就退出了货币领域。可是海贝做为货币，在云南却一直流行到明末清初的时候，人们称之为海肥。

人类社会有了商品生产就产生了货币。

货币的形成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一开始时是商品的直接交换，然后物物交换固定在“一般等价物”上，也就是所有的商品在交换前都要和这种商品进行比较，才能确定它的价值大小，从而使这种特殊的商品能够体现其他商品的价值，这种特殊的商品日后就成了社会商品流通的价值尺度，而货币的第一个职能也就从这种一般等价物中显现出来了。

中国的农业很早以前就十分发达，在中国古代的货币史上，最早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是农业工具——镈。而后来人们就按照这种工具的形状铸造成便于携带和储藏、质量经久不变、量小质大的货币，这就是日后的空首布。之所以叫这种货币为“布”，是因为布字在古代和农具“镈”字通假，因而人们就将日后源于农具的货币称为布币。



空首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金属铸币。近百年来，在殷墟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空首布上面的文字和甲骨文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其笔意和文字的刀法都与甲骨文相似，而且空首布还保持了与原来农具基本一致的样子，货币上端也就是人们称之为首的地方是空的，可以插入木柄。

这些货币大多出土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一些地区，史载武王灭纣后，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武王去世后，管叔和蔡叔两人帮助武庚进行叛乱，后来被周公镇压。周公将殷民迁至成周洛邑，这样一来，殷人的文化中心即迁至洛阳一带，而空首布上的文字又和原来殷人的甲骨文一致，因此，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和中国的“商”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货币本身的发展要求其向更便于携带和计数的方向发展，因而在春秋晚期，我国就出现了一些上面标有“釒”字的布币，这些布币的首就不再是空首的了，比空首布也小了很多，人称平首布。

春秋时代的魏国和赵国都铸造过这种布币。三晋地区最早出现的货币型式是空首耸肩尖足大布，和中州一带出土的布币是不一样的，二者相较，三晋的空首布首长，币面及背都有3条平行长线，耸肩、足尖且长大，基本无文字。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古吴地西周和春秋文化层中发现了一批窑藏的青铜块，由于这些青铜块在发现时为被打碎的铜块，而且同一批窑藏的铜块，经检验其成分又可证明不是同一铜饼之物，因而可以证明这些青铜块确实是经过流通的古代中国的称量货币，具体而言是我国古代吴国的称量货币。

现在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一大批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戈币”，这种戈和古代作战用的“戈”基本一致，只是形制较小，可以基本肯定是越国的货币。人们将这种“戈币”从大小、重量上分成4种，特大型，长120毫米，重量超过10克；大型，长110毫米左右，重量5.8克左右；中型，长度在90



毫米左右，重量 3.8 克左右；小型，长度在 80 毫米之间，重量 3.3 克左右。

在古燕地，最早的铸币是尖首刀。

战国时期，万乘之国有齐、楚、燕、赵、韩、魏、秦。还有一些千乘之国，由于社会生产的发达和列国经济的交往，一般都铸造了自己的货币。战国时代是我国青铜文化最为发达的时代，也是中国货币文化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让我们看一看各国都铸造了一些什么样的金属货币吧。

齐国，东方的大国，靠近大海，自古渔猎十分发达，刀子在这一地区的作用十分重要，因而齐国的货币就由一般等价物刀子转化而来，从而大量铸造刀币。齐国的刀币厚重而精致，上面铸造有齐法货等文字。齐国的大型刀币现在已经发现了 7 种：齐建邦长法货、齐法货、齐之法货、即墨法货、齐之法货、即墨之法货、安阳之法货。人们现在认为，齐国最早的铸币是齐之法货，铸于春秋早期，即墨、安阳均为地名，为齐灭古莱国、莒国入其版图后所铸。为春秋晚期，齐法货为战国中期铸造，齐建邦长法货则为田氏代齐后铸造的纪念币。到了战国后期，齐国还铸造了自己的圜钱。齐国的圜钱分为 3 种，一种是益化、一为益四化、一为益六化，有的学者认为一化即为 1 枚齐刀。

燕国，也是靠近沿海的北方渔猎之国，刀币极为通行，所铸刀币上有一个“明”字，人称明字刀。最近以来，人们通过考古和其他的一些途径又发现了一些战国时期燕国的刀币。和齐国一样，战国后期的燕国也大量铸造了圜钱，上面铸造有“一化”和“明化”的字样。燕国还曾经铸过一种只在山东通行的刀币，这种刀币清代嘉庆年间第一次在山东博山香峪村出土，人称博山刀或齐明刀，这是燕军攻占齐国后在齐地铸造的刀币。燕国还铸造有自己的布币，燕布耸肩、束腰、长足。这种布币现在已经发现了有七种铭文的，它们是安阳、襄平、平阴、广昌、韩刀、宜平、寒号、右明司强等，这几种铭文多为地名，多在燕国与赵国